



十七至十八世纪 俄国农民战争

И. И. 斯米尔诺夫、
А. Г. 马尼科夫、
Е. П. 波季亚波利斯卡娅、
В. В. 马夫罗金 合著

3
人 民 出 版 社

X512.3

2

2

十七至十八世纪 俄国农民战争

И. И. 斯米尔诺夫、

А. Г. 马尼科夫、

Е. П. 波季亚波利斯卡娅、

В. В. 马夫罗金

合著

[苏]

张书生、邹如山、郝镇华译

人 民 出 版 社



B022331

编辑委员会

И.И.斯米尔诺夫(主编)、
Н.Е.诺索夫、А.И.科帕涅夫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ВОЙНЫ В РОССИИ

XVII—XVIII В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66

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

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战争

[苏] И. И. 斯米尔诺夫、А. Г. 马尼科夫、合著
Е. П. 波季亚波利斯卡娅、В. В. 马夫罗金

张书生、邹如山、郝镇华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0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87,0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书号 11001·555 定价 1.25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1606—1607 年的农民战争(И.И. 斯米尔诺夫)	4
前提	4
预兆	12
开始	29
向莫斯科进军	38
围攻莫斯科	46
卡卢加时期	65
土拉保卫战	86
历史意义	98
第二章 1667—1671 年的农民战争(А.Г. 马尼科夫)	105
前提	105
开始阶段。向雅依克河和里海进军	116
向伏尔加河进军。占领阿斯特拉罕	134
在伏尔加河中游、斯洛博达乌克兰和俄国其他地区的战争	153
起义被镇压	183
后果和历史意义	196
第三章 1707—1709 年的农民战争(Е.П. 波季亚波利 斯卡娅)	202
前提和预兆	202
动力	206
第一时期	208
第二时期	212

第三时期·····	222
历史意义·····	230
第四章 1773—1775 年的农民战争(B.B.马夫罗金)·····	234
农民战争的前夕·····	234
第一时期·····	249
第二时期·····	281
第三时期·····	287
起义者的意识形态、政权机构及其士兵和领袖·····	300
起义者的失败和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328
第五章 苏维埃历史科学论俄国农民战争(B.B.马夫罗金)·····	338

前 言

本书是专门论述 17—18 世纪俄国最大几次阶级斗争的集体专著，即 1606—1607 年的农民战争（波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 年的农民战争（拉辛起义），1707—1709 年的农民战争（布拉文起义）和 1773—1775 年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起义）。

出版这样一部书的必要性，是由本书的论题本身决定的。如果可以利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名言“至今所有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来阐明俄国农民战争的问题，那么，关于 17—18 世纪俄国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可以说这首先是四次农民战争的历史，因为它们是贯穿 17—18 世纪封建农奴制俄国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的主要标志。

这也决定了把农民战争史作为 17—18 世纪俄国阶级斗争史的中心问题加以研究的迫切性。

苏联历史科学对农民战争在俄国历史上的意义所作的这种理解，既与革命前俄国贵族—资产阶级史学的观点相对立，也与现代资产阶级史学的观点相对立；后两派某些代表人物的观点尽管有种种差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农民战争持坚决否定的观点，视之为“毫无意义的和残酷无情的叛乱”。

苏维埃历史学家认为，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发展经过的主要干线，因此，他们对本国史中需要用最大气力研究的篇章之一的农民战争问题颇感兴趣。在这方面，苏维埃农民战争史学的突出特点，是出版了有关拉辛、布拉文和普加乔夫起义的、有重大价值的

同样的多卷本史料丛书（包括新发现的有关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丰富史料）；对从波洛特尼科夫到普加乔夫的各次农民战争的历史大力进行专题研究；最后，对农民战争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也进行激烈的讨论。这与贵族—资产阶级的农民战争史学相比，是一个特别鲜明的对照。后者的突出特点也同样是对农民斗争持坚决敌视态度，对农民斗争史的研究表示漠不关心和置诸不理。

苏联历史科学在研究农民战争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为撰写俄国农民战争史的综合性著作（它们应以专门研究著作的结论为依据，不仅应对历史学专家有用，也应对更广大的各类读者有用）创造了前提。我们这本书就是编写这样一部著作的尝试。

集体专著应把作者们对农民战争史的主要原则问题的共同想法和共同观点结合起来，兼收作者们在论述各次农民战争的具体历史时发表的个人创见。本书作者们就是在编写这样一种集体专著的过程中寻找解决他们面临任务的方法的。作者们也符合这样的意图，其中三个人（В. В. 马夫罗金、Е. П. 波季亚波利斯卡娅、И. И. 斯米尔诺夫）写了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性著作，第四个人（А. Г. 马尼科夫）是论述 17 世纪下半期——正值拉辛起义败退时期——俄国农奴制发展的专著的作者。

本书的类型也决定了书的结构：有四个专章具体论述四次农民战争，结束本书的第五章是一篇概括性文章，其中包括对史料研究的评论，并探讨了农民战争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最后，应当指出本书还有一个特点。作者们（和编者）认为，如果农民战争史的某个问题大家都认为没有解决，则在论述农民战争时可将争论或讨论的重大问题保留下来。

这种尚在讨论中的重大问题在本书各章中都有，如一开始就有是否应把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定为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的讨论，

有是否把布拉文起义算作农民战争的事实本身的讨论，最后，有如何确定 17 世纪两次农民战争的年限范围的讨论。属于讨论性的还有关于农民战争直接影响 17—18 世纪俄国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性质问题的解释，以及农民战争胜利后有两条可能发展的路线的论点——一条是农民战争的上层人物向封建蜕化，另一条是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自由发展。

作者们(和编者们在本书中保留这些讨论的重大问题时，所遵循的是下面两种意见：第一，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有在科学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那些争论能起仲裁人的作用；第二，他们认为，应当向读者提供可能性，使他们自己分析俄国农民战争史中那些争论的和讨论的重大问题。

第 一 章

1606—1607年的农民战争

俄国在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结束 16 世纪，进入自己历史的“新时期”^①。同时代的人们已经看出了这一危机的规模和性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即负有伊丽莎白女皇特殊使命于 1588 年访问俄国的英国外交官吉尔斯·弗莱彻有一句名言：笼罩着俄国社会的“普遍怨言和不共戴天的仇恨”，证实了“显然必定要以内战来结束这种局面”。弗莱彻在他那部于 1591 年在伦敦出版的著作《论俄国》中所作的这一历史性的预言，已为后来事件的发展所充分证实。1607 年初，另一位英国外交官乔恩·梅里克自莫斯科向伦敦英国政府早就呈送了一份关于《俄国状况》的特殊报告，该报告描绘了当时在俄国汹涌澎湃的“内战”——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炽烈情景。

前 提

揭开 17 世纪俄国历史的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是封建罗斯的基本阶级斗争——农奴反对封建农奴主的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反映。这一斗争的根源在于俄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本身，在于它的经济基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34 页。

波洛特尼科夫起义以前，俄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在经济发展领域内的特征是封建社会经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15—16世纪形成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为封建罗斯经济条件的变化所造成，又促进了封建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16世纪俄国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加强首先反映在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发展上。

这一过程的反面是“官地”农民的土地^②减少了，在许多地区甚至几乎完全消失了。

莫斯科政府在分封大量领地时，首先和主要地是从官地农民的土地中获得为此所需要的土地。从下面这样一个措施中可以认识到莫斯科政府土地政策的规模，即1550年在莫斯科周围安插了成千名地主（“最好的仆役”），为了实现这一点所需要的耕地达十五万俄亩以上。

50年代初期伊凡四世政府进行的和延续了整整三十年的土地普查，对于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发展有着更加巨大的意义。伴随着这次普查，同时还在全俄境内将土地大规模分配给地主。

也把官地慷慨地分给寺院。莫斯科国君把官府村庄以十计地赐给寺院。寺院当局也侵吞官地来积极促使寺院世袭领地的扩大，而不止于直接侵占农民土地。

伴随着16世纪俄国封建地产在数量上的增加，同时在封建世袭领地内部、在封建主的私人经济中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16世纪下半期贵族耕地增多了。

16世纪贵族私人耕地的增多与国内市场的发育有着直接联系。

16世纪俄国经济的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生产的发展。

② “官地”（“Чёрные земли”）是不属于私人封建地主的土地。以这些土地为生的农民向封建国家交纳捐税和贡赋。

反映在手工业、城市和商业发展上的社会分工的增长；市场联系的加强；市场关系范围的扩大——所有这些便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不能不触及封建主经济及与之紧密相联的农民经济。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市场联系的增长，既然造成了通过买卖来交换产品的条件，因而不仅为封建主提供了消费实物形式的农奴劳动产品的可能性，也提供了通过市场、市场关系来交换这些产品以获得任何其他产品的可能性。这样，封建主对于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用剥削农奴劳动的方法榨取来的剩余劳动数量的兴趣便急剧提高了。

但是，为了使商品生产的发展给封建主阶级造成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就需要相应地改造封建主自己的经济，使其适应新的经济条件。但是，封建主阶级的不同集团对待已经变化的经济条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封建贵族，即波雅尔贵族*和公爵们，他们的世袭领地内的整个经济结构是建立在农民实物贡赋的基础上，因而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公爵和波雅尔贵族们在16世纪力图不惜任何代价，直至将自己世袭领地内的土地通常抵押（或卖）给寺院以获得货币，使他们的债务大规模增加，这种特殊现象已为研究者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它们可以作为在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在货币的作用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封建贵族无能改造自己经济的标志。

封建土地占有者的另一些集团，即贵族地主和寺院，对于已经变化的经济生活条件，则采取另一种态度。这一部分封建主之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表现在力图增加他们用封建贡赋的形式从农民那

* 波雅尔贵族——古代俄罗斯的世袭大贵族。——译者

里获得物质财富的数量上，表现在这些贡赋的性质朝着使他们能够从对农民劳动的剥削中获得最大效果的方向的变化上。

封建主用扩大自己领地内贵族耕地的方法和加强对农民的农奴制剥削而使这些任务得到了解决。

16 世纪下半期农民经济中也发生了同样非常重要的变化。如果对于封建地主自己的经济来说，16 世纪下半期它在经济上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如上所述是贵族耕地的增长，那末相反，对于 16 世纪下半期的农民经济来说，它的特征是独户农耕地的数量急剧减少。独户农耕地数量这种极度减少的情形，发生在俄国中部诸县、诺夫哥罗德地区和普斯科夫地区，即封建土地占有制具有最大比重的地区。

土地关系方面这些现象的社会意义是不难理解的。贵族耕地的增加和农民耕地的减少，意味着 16 世纪俄国社会基本阶级之间——封建主和农民之间——土地的再分配，其实质就是封建主—地主掠夺农民土地的再分配。

农民贡赋性质的变化，与 16 世纪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随着贵族耕地的发展，农民耕种这种耕地的徭役增加了，即徭役制发展了。农民义务中徭役比重的增加，是 16 世纪俄国经济发展最有特色的现象之一。关心扩大贵族耕地的土地占有者，拼命向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农民推行徭役制。徭役制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土地占有者剥削农民的程度加强了。

封建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16 世纪有了发展，这个过程在关于农民问题的立法中得到了法律上的反映和保障。国家政权在自己的政策中反映封建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它积极干预社会关系，用关于农民问题的立法为封建主攫取农民的土地和劳动成果创造了法律根据。

沙皇特辖区时代是农奴制发展中的新阶段（1565—1572 年）。

可以指出足以说明特辖区引起农民状况变化的三个因素：农民土地被侵占；争夺农民这种劳动力的斗争加剧；农民徭役增加。

在特辖区年代没收大贵族和公爵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发生了封建主侵占农民土地。上述独户农耕地的急剧减少，正是发生在特辖区年代。

与侵占农民土地的同时，特辖区使农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当时的文件保存了禁卫兵破坏农民经济并对农民使用暴力的明显事例。下面是禁卫兵到过的诺夫哥罗德某村庄的官方记录：“在丘拉克什的一个村庄里，伊格纳特克·卢强诺夫那块地由于特辖区面荒芜了——禁卫兵们抢劫家畜（财物。——И·斯米尔诺夫注），鞭死牲口，他本人也死了，孩子们逃得不知去向；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大、小木屋子。在同一个村庄里，叶列麦克·阿法纳索夫的地段由于特辖区而荒芜了，——禁卫兵们抢劫家畜，打死他本人，他没有儿女；只剩下了木屋子和畜棚。在同一个村庄里，麦连泰克的地段由于特辖区而荒芜了——近卫兵们抢劫家畜，鞭死牲口，他本人逃得杳无音讯”。这就是近卫兵行为的典型例证！

农民使近卫兵感到兴趣，不只因为他是一种掠夺对象。更重要和珍贵的是，他在封建主看来是一种劳动力。这正是沙皇特辖区时代特有的争夺劳动力斗争达到如此尖锐程度的原因。在沙皇特辖区年代，农民的迁徙权比以前更多地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地主有权把他们所需要的农民迁徙到自己土地上来。

沙皇特辖区本身带来了农民的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强，使农民贡赋的数量急剧增加。根据同时代人——外国人陶白和克鲁彻——的见证，近卫兵—地主把农民贡赋的数量增加好几倍。“贫苦农民一年缴纳应该于十年内交出的东西”。另一个同时代人、俄国作家季诺维依·奥登斯基谈到，“占有者”开始向“隶属者勒索比以前多得多的贡赋”。

沙皇特辖区强有力地影响了俄国的整个经济。16 世纪下半期俄国经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即所谓 16 世纪 70—80 年代“经济危机”，是与沙皇特辖区有着直接联系的。公爵—大贵族土地占有制的破坏，土地的大量动用，成批新的大地产的出现，由于农民经济受剥削的加强和破产所造成的农民状况的急剧恶化——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给国家的经济带来恶劣影响的多年的立窝尼亚战争，使俄国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在 16 世纪 70—80 年代爆发了成为巨大力量的真正的经济危机。70—80 年代的危机表现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内：既表现在商业的凋敝上，又表现在国家财政的紊乱上。但是危机表现的主要形式是所谓“中部地区荒废”，即俄国中部地区由于城乡居民的逃亡而大规模荒芜，他们抛弃自己的家园，“荒废”（即停止耕种）土地，把田地变成“撂荒地”，使它长出了“森林”。这种荒芜的规模在某些地区（诺夫哥罗德地区）达到全部耕地的五分之四。“荒废”也强烈地反映在城市中，城市里常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居民。

农民大规模逃亡（莫斯科官府派遣专人“替国君找回逃亡的农民”，这样的措施也无助于对付逃亡现象），使封建主阶级和反映他们意志的国家政权面临着在农民问题上必须采取新的坚决措施，使之能保证土地占有者可以无阻拦地剥削农民劳动，同时加强了封建主对于农民人身的权力。

这些导致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措施，发生在 16 世纪最后二十年。这些措施的实质，在于用取消农民外流权的方法彻底奴役农民。

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从法律上形成农奴制的问题，这是从塔季舍夫起二百多年来一直引起俄国历史科学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苏维埃历史学家的著作，可以认为已经成功地得到了解决。

1581年颁布“禁年”法是在废除农民外流权利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性措施。这一法律取消了农民外流的权利，规定了“禁年”，即规定了“禁止”（不允许）农民外流的年代。取缔农民外流的这种方式（规定“禁年”，而不是直截了当地禁止外流）是出于单纯策略上的考虑：力图避免爆发农民反对农奴制立法的斗争。作为临时措施宣布的“禁年”，实际上意味着取消农民一般外流的权利，虽然同时代人传说“国君是愿意农民外流的”。

与颁布“禁年”法同时，伊凡四世政府用在俄国组织新的土地普查的办法，开始巩固这一法令的成果。这次从1581年持续到1592年的普查的目的，是把正赶上“禁年”的那些地区内的农民都写在土地财产登记册上。这些土地财产登记册是证实地主对于居住在他土地上的农民拥有权利的基本文件。

在关于农民问题的立法方面，第三个最巨大的措施是1597年颁布搜查逃亡农民的法律。这一著名法律是前两个法令——规定“禁年”和编制土地财产登记册——合乎逻辑的结果。1597年法律规定，该法令颁布以前从地主那里逃走不足五年，即在1592年以后逃走的农民，应该回到他们原先的领主那里。相反，该法令颁布以前“六年、十年或十年以上”逃走的农民，则留在新领主那里，不需要回去（1597年法令颁布以前已经提出归还这些农民的诉讼的情况除外）。1597年法令对待逃亡农民的双重态度，是由于1581年开始的编制土地财产登记册的工作正是在1592年结束的。

可见，1592年以后逃亡的农民应该在原先领主的土地财产登记册上注册，而1592年以前逃亡的农民则在已属于新领主的土地财产登记册上登记，这便为把逃亡农民固着在注册官于“禁年”里碰上他们的那些地区里制造了法律根据。

后来，1597年的法令就显然采用了“寻找逃亡农民期限”的通则，规定搜查逃亡农民为五年的限期^③。

奴仆是16世纪俄国封建—依附居民的一个特殊集团。奴仆制因为是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变种之一，故具有一系列特点，使他们与农民既在各自固有的公民权的大小范围上，又在经济关系上互相区别开来。

16世纪在俄国奴仆制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6世纪奴仆制发展的特点表现在两个主要因素上：完全的奴仆制消失了，而卖身奴仆制大规模流行。

卖身奴仆制虽然起源于遥远的古代，但仍然是16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新现象。卖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与16世纪俄国经济中的新现象有着直接联系，这些新现象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增长，及与此有联系的货币作用的加强。卖身奴仆制也是封建农奴制依附关系赖以向自由居民中的新阶层扩张的一种制度，这些新阶层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不能保持经济上独立的私人经济，被迫卖身为奴，因为他借了货币，同时还要偿还“差役增加”后的债务，即是说，他要为自己的主人—债权人劳动。

卖身奴仆制使封建主更易于将尚未遭受奴役的居民阶层纳入封建剥削范围（使卖身人存有恢复自由的机会的幻想），同时也就使卖身人的劳动比完全奴仆的劳动较为有生产成效（因为卖身奴仆力图积攒还债所必需的钱，具有完全的奴仆所没有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因素）。但是，从封建主的观点来看，卖身奴仆制有一系列缺点，主要是没有充分固定的期限将卖身人束缚于主人。因此，将卖身人束缚于主人的问题，正是16世纪下半期围绕奴仆问题斗争的中心问题。

在卖身奴仆制问题上的斗争，是16世纪下半期俄国农奴制普遍加强过程的表现之一。载入1597年2月1日沙皇费多尔·伊

③ 在1594年的文件中已经看到有这样的引文：“按照国家的命令，法庭必须判决五年内的农民返回农民份地，其生活超过五年以上者不予判令归还。”

凡诺维奇法典中的这一斗争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一法典在奴仆制历史上起着 16 世纪 80 年代“禁年”法在农民历史上所起的同样的作用。

1597 年法律引起了卖身奴仆状况的根本转变，因为它剥夺了卖身人用还债的办法打碎自己依附关系的可能性，确立了卖身人一直服役到自己主人去世为止的原则。

这样，卖身奴仆和农民一样，到 16 世纪末被剥夺了转移权，被束缚于其主人。

16 世纪 80—90 年代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俄国农奴制。但是，因为这些法律打击了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它使得社会气氛如此白热化，以致公开爆发农民反对日益加强的封建压迫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预 兆

应该在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俄国农村的形势中，在说明“禁年”和取消尤里耶夫日* 时代农民和封建主相互关系的那些现象中，去寻找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根源。

16 世纪下半期封建主进攻农民是朝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的：侵占农民土地和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也就决定了农民和土地占有者之间社会矛盾的性质：农民为土地而斗争，反对日益加强的农奴制。

土地是农民和封建主之间争夺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封建罗斯，土地问题的这种意义是从封建社会制度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封建主阶级对土地——封建主义时代决定性的生产资

* 尤里耶夫日，14—16 世纪农民可以脱离封建主的时间，即尤里耶夫日前后各一周的时间。——译者